

可有豪情似昔时

——纪念我的母亲韦君宜百年诞辰

○ 杨 团



一九三五年在清华读书时的韦君宜

韦君宜，原名魏蓁一，1917年生于北京。1934年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，在校时参加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39年到延安工作。解放后，历任《中国青年》总编辑，《文艺学习》主编，作家出版社总编辑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、总编辑、社长等职。2002年1月26日在北京病逝，享年85岁。一生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《母与子》，中篇小说《洗礼》（获中国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）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女人集》《老干部别传》《旧梦难温》，以及散文集《似水流年》《故国情》《海上繁华梦》等。最为著名的是其晚年所

写的回忆录《思痛录》和自传体小说《露沙的路》。

我的母亲韦君宜，原名魏蓁一，湖北建始人。她生于1917年，歿于2002年。她的一生经历了中国20世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，为了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，她自18岁在清华大学参加“一二·九”运动始，就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，携笔挟枪，万里从征。

战争年代，刀剑斧锯在前，她甘之如饴。文革当中，她被打成“走资派”，受尽苦难，甚至一度精神失常。1972年还在干校的她“被解放”后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所有受冤屈的干部群众内查外调、洗去污名，将那些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。1976年，“四人帮”垮台了，一时间，文学作品成了人们反思历史和时代的炮筒，母亲突破各种禁锢，竭尽全力支持冲破思想禁区、否定文革的好作品，充当了发端于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。她以行动站在了20世纪中国大革命的前列。

最能体现母亲思想的，是她编撰的长篇回忆录《思痛录》。那时，还在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之前，政治空气极端恶劣，母亲虽然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主要领导，但



一九八〇年左右，
韦君宜在外地组稿

军宣队还在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发现她写东西不同往常，改变了写东西乱丢的习惯，出门和在家吃饭前都将稿子收好。一次我伸手去拿那稿子，被她一把推开。问她写什么，她也不说。母亲写东西如此保密在我的记忆里印象很深很深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她才向我公开了她的秘密，这是专写党内历次运动的回忆录，自1941年抢救运动始至文革结束。她告诉我，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，要对后代负责！她18岁参加共产党，那时已经60多岁了，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剧和荒唐记录下来，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。

我后来才逐渐明白，当时不但写作就连有这种想法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。《思痛录》其实不止是母亲一个人痛定思痛的回忆和反思，它更代表了“一二·九”时期参加革命的整整一代知识青年的记忆。为了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，他们千辛万苦，抛弃一切，牺牲一切，而一生经历的却是历次极左路线运动造成的空前灾难。这对于终生怀抱青年时期理想但已经老去的母亲，怎能不痛彻心脾？

但是，这个国家“是我的”，是我们流血牺牲奋斗换来的，是不能丢弃的。在《思痛录》缘起中，母亲这样表达她的期望：写这本书的“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，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，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，兴旺发达。”

今年是2018年了，《思痛录》出版已经整整20年了。21世纪的中国，正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。《思痛录》不仅是母亲的，也是上一代知识分子留下的思想遗产。现在读来，仍然振聋发聩，也为他们那一代以生命换来的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而感奋不已。

我今年69岁了，回想母亲的69岁生日，恰值“一二·九”运动发起50周年纪念日，她当时写了一首词，最后四句是：

五月鲜花依旧好，一曲歌终千绪绕。
可有豪情似昔时，殷勤拭眼删残稿。

可见，1985年69岁的她，仍然是那个“论理直而切、推心热而诚”的“一二·九”青年，为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的豪情仍然在胸中激荡。

她一生反对世故、圆滑、虚伪，不得已说过的违心话都一再反省和忏悔。她十分理解青年，无论身置何处，只要是青年需要，她都赤诚回应。记得《中国青年》创刊50周年请她题词，她已经半身不遂，提笔写字很困难，但还是用残疾的手，歪歪扭扭地写下了“青年人要热爱祖国，怀抱大志，追求理想”的祝词。

母亲过世的那一年，2002年春末，我随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考察团到了延安，走遍了延安的山山水水，我特地在杨家岭、清凉山父母住过的窑洞前凭吊。我的父亲母亲，曾在这里度过了他们青春岁月